

界各国受到普遍保护。③借鉴国外经验,建设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。在建立中医药自有注册登记和发明专利体系方面,印度的经验值得借鉴。印度专门建立了印度传统医药注册和发明专利体系,这是为发明人注册发明创建的一个体系。这一体系给予发明者以同等权利,以对抗任何未经事先允许而使用发明的行为。而对于那些新颖而有用的发明,该体系设立了一些给予有限保护期限的小型专利。关于注册登记,印度也开展了部分工作。“蜜蜂数据库”(Honey Bee database)是为发明人注册其发明设置的工具平台。其他人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改良这些发明,也可以与发明人和知识提供者分享利益。“蜜蜂数据库”包括了原住民的知识归档、实验和推广。通过一定的传媒形式,相关发明被推广到数十个国家,较好地实现了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的协调统一^[1]。

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,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。因此,相关的各项保护措施需要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,有计划、按步骤地落实,构建全面和重点保护相结合的综合防护工程。为中医药传统知识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。

参考文献

[1] 王兵,陈维国,姚玲.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保护中药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[J].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2,17(1):73-77.
[2] 梅智胜,肖诗鹰,黄璐琦,等.印度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[J].国际中医中药杂志,2007,29(2):81.

《本草备要》医论药话评析

黄 辉

(中医药临床杂志社,230061)

《本草备要》为清代康熙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人汪昂(1615~1694)所编,汪昂有感于以往本草“备而不要”的不足,由博返约,删繁就简而编成。该书问世300余年来一版再版,深受初学者欢迎。《本草备要》汲取了不少新知创见,在医理药论和本草出版方面也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观点或主张。今选数则医论药话试加评析,以窥其一斑。

1 本草方书若不明所由,则难谘观者心目

【原文】自唐宋而下,各家百氏方书,非不灿陈,而义蕴殊少诠释。如本草第言治某病某病,而不明所以主治之由;医方第云用某药某药,而不明所以当用之理。千书一律,开卷茫如,即间有辨析病源、训解药性者,率说焉而不详,语焉而不畅,医理虽云深造,文字多欠通明,难以谘观者之心目。(原序)

【评析】关于药物“主治之由”,早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就有阐释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药多朴实有验,偶也以其性味功效注释主治,虽十分粗略,但已开性味、功用、主治分析说理之先例;南北朝时期陶弘景也意识到,这种“本草”“药之所主止说病之一名”的注法“未尽其理”,但为时代所限及崇古尊经思想束缚,陶氏及唐宋诸家都一致采取“附经为说”的方式,不断兼收并蓄、补充说明,滚雪球般重重叠叠,其主治、功效混列难明,后学无所适从。南宋《纂类本草》始分项解说,金元之后开始注意从主治中提炼功效,但直到明中期《本草品汇精要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,虽

分有“治”或“主治”专项,却无“功效”专项,其功效仍混列于主治之中,无明显畛域之分,影响了本草著作的学术性和可读性。明末本草功效内容激增而有分列记叙者,贾所学之《药品化义》列出八款对药物进行阐释,其中“力”款就明显具有分列功效的意图。在此基础上,《本草备要》另为体裁、别开径路,首倡“先言功效、后列主治”的编撰体例,高标特行,“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,次著其所入经络,乃为发明其功用,而以主治之证,具列于后。其所以主治之理,即在前功用之中”。以“功用”统摄“主治”,无论是临证用药还是对药物应用机理的阐释,均从中药功效中推出,突出了功效的核心地位。这一著述方式为后世所尊奉效法,自此“本草”体例格调为之一新,功效在临床中药学中的核心地位从此确立。

至于组方用药之理,《黄帝内经》载方13首,提出了辨证、立法、处方、配伍等原则,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载方374首,以病脉证治统括诸方,而“方之有解始于成无己”,继宋代成无己论证《伤寒论》方,入清之后则由汪昂辑为《医方集解》,进一步从病源、脉候、脏腑、经络、药性、治等阐述大义,又由于功效的纽带作用,中医学理、法、方、药真正形成统一的整体。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两书开创了近现代中药学、方剂学编写体例之先导,也体现了汪氏注释药方“一以功效为重心”的学术思想。

2 注本草者,当先注病证

【原文】注本草者,当先注病证。不然,病之未明,药于何有?(凡例)

【评析】据《本草备要》所言,此前之注本草者“罕明斯义”,“第云某药入某经治某病而已”,难为民所用。汪氏编撰是书,“释药而兼释病”,“药性病情,互相阐发,以便资用”,各药条下不仅介绍了药物的性能功效,更引用了大量治疗学内容,包括疾病的病因病机、诊断鉴别、治则治法、方药、预防等。注药论病、医药合参,精简选药、采掇诸家,突出实用、切合临床。作者出书为民所用、济世救人主导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。

3 甘草重用方能建效

【原文】甘草之功用如是,故仲景有甘草汤、甘草芍药汤、甘草茯苓汤、炙甘草汤;以及桂枝、麻黄、葛根、青龙、理中、四逆、调胃、建中、柴胡、白虎等汤,无不重用甘草,赞助成功。即如后人益气、补中、泻火、解毒诸剂,皆倚甘草为君。必需重用,方能建效,此古法也,奈何时师每用甘草不过二三分而止,不知始自何人,相习成风,牢不可破,殊属可笑。附记以正其失。(卷一·草部)

【评析】汪氏论药,多遵古法,肯定“前人识见深远,不易测识”,对时医“背弃古法”深感痛心,常常引述前人之训并结合己见加以论证和阐发,或慎思明辨以纠正时弊,或提出创见以嘉惠后学。上文中,他对时师“每用甘草不过二三分而止”且相习成风颇不以为然,引举张仲景重用甘草诸方加以论说。陶弘景曾说:“此药最为众药之王,经方少有不用品者”,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共374个方中,有164个方用了甘草,其中炙甘草汤、桂枝汤、甘草泻心汤、甘草干姜汤,每方每剂各重用甘草至4两(合今约55.68g),用量最轻的防己黄芪汤也用至半两(合今约6.96g)。张仲景重用甘草主要是益气温中、甘缓急、斡旋升降,其次是调和营卫、健脾和胃、平调寒热;小量甘草主要是助麻、桂解表。据现代药理研究,甘草抗炎、抗变态反应、抗组胺、

抑制胃酸分泌、解除肠胃痉挛、镇咳、镇痛、增强清热解毒药物抑菌作用等多种药理作用,作用广泛而明显。实验研究表明,甘草 1~2g 在药方内起调和作用,用到 5~10g 有温胃养心的功能,30g 以上有类似激素样反应。故而以甘草调和诸药、辅助解表以及增效解毒等,“二三分”用量一般而言确也足矣;但凡虚寒内里之证,需甘辛化阳、补中温阳、温肾助阳以促其阳生阴长者,均有必要重用甘草,乃至调和营卫、健脾和胃、止咳化痰也当以甘草为重,总当以大剂量使用而能发挥出其本身所特有的疗效为要旨。

4 暑必兼湿说

【原文】暑必兼湿,治暑必兼利湿,若无湿,但为干热,非暑也。(卷一·草部)

【评析】有关“暑湿”之说,清代叶桂《临证指南医案·外感热病篇》中也有“暑必夹湿,二者皆伤气分”的记载。由于叶桂系一代宗师,故谓其首倡“暑必夹湿”者甚众。《本草备要》成书于 1682 年,时年叶桂仅 15 岁,且 1693 年与《本草备要》同期梓行的《医方集解》和《汤头歌诀》中也有类似记载,至于《临证指南医案》直至 1764 年方才成书,故应是汪昂更早提出这一观点。

叶桂(1667~1746),字天士,清代著名温病学家,其祖父叶紫帆为新安名医,自歙(徽州)迁吴(苏州)。叶天士在医学上的成就与徽州即新安地区有一定的渊源,他与歙县潭渡盐商黄晟四兄弟往来甚密,黄氏兄弟时居扬州,有“青芝堂”药铺和木刻园,曾延请叶天士到家中共同考订药性,《临证指南医案》等医书也是由黄氏为其刊刻。而汪昂(1615~1694)晚年其实是一位致力于医学启蒙的出版家,除本人开有延喜堂外,主要在杭州还读斋从事医学创作和出版工作,其读者定位“上达宰相,下及妇孺”,叶桂是很有可能拜读过汪昂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和《汤头歌诀》。笔者认为,汪昂所创“暑必兼湿”说,是中医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,为叶桂以后的暑病治疗制定了基本原则,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。

5 人之记性皆在脑中论

【原文】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:人之记性皆在脑中。小儿善忘者,脑未满也;老人倦忘者,脑渐空也。凡人外见一物,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。昂思:今人每记忆往事,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,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,不经先生道破,人皆习焉而不察矣。李时珍云:脑为元神之府,其于此义,殆有暗符欤。(卷二·木部)

【评析】金正希(1598~1645),名金声,古徽州府休宁人,明末进士,抗清义军首领。金声曾在京师向西人学习历算之学,接受了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脑学新说。汪昂治学博采众长,对明末传入我国的西洋医学持开明态度,认为西医虽不明气化之理,但对于形态方面的论述则较为确实。尽管与中医传统的“心主神明”之说相悖,他还是很敏锐地意识到“脑主记忆”之说的重要价值和意义,及时将“人之记性皆在脑中”观点载入《增补本草备要》及《尺牍新语》之中,并着力加以阐发,指出其义与李时珍“脑为元神之府”暗符,力图将当时关于脑的中医最新观点与西方医学脑的功能融合在一起,堪称中西医结合之先驱。明清之际,与汪昂同时接受西方医学知识的还有方以智(著《物理小识》)、赵学敏(著《本草纲目拾遗》)、王宏翰(著《医学原始》)等,由于《本草备要》流传甚广,故在诸家中影响最大。

尽管当时还缺乏观测分析的高科技手段,汪昂仍以其严谨求实的精神和丰富的思辨能力,提出足以启迪后人的分析求证。文中有“昂思:今人每记忆往事,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,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”一语,考“思”字从“囟”从“心”,系“囟”与“心”结合之会意字,从造字之初始本义来分析,所谓“思”就是脑与心结合产生的功能,《黄帝内经》强调“心主神明”,而西汉时期儒家七纬书之一的《春秋元命苞》则有“人精在脑”、“头者,神之居也”的记载。“心主神明”之说与“脑主记忆”的观点各自表述了生命活动的不同方面,我们不妨将两者作为人的意识思维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,并存于中西医学两大医学理论体系之中。

6 龙脑体热而用凉论

【原文】王纶曰:(龙脑)世人误以为寒,不知辛散性甚,似乎凉耳。诸香皆属阳,岂有香之至者而反寒乎?昂幼时曾问家叔建候公云:姜性何如?叔曰:体热而用凉。盖味辛者多热,然风热必藉辛以散之,风热散则凉矣。此本草所云冰片性寒之义,向未有发明之者,附记于此。(卷二·木部)

【评析】冰片之药性,历来众说纷纭。《名医别录》有载,但仅有主治、用法而缺“气味”。唐代《新修本草》载:“龙脑香,味辛苦,微寒。一云温、平、无毒。”宋代《证类本草》延用了《新修本草》一药多性的说法。金元时期,张元素说“龙脑香性热”,朱丹溪说“龙脑属火”,又说:“世知其寒而通利,然未达其热而轻浮飞越。”从金元之张元素到明代之王纶,皆主冰片药性之“温热说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(1578 年)及缪希雍《神农本草经疏》(1623 年)也支持王纶的见解,李时珍说:“目病、惊痫、痘病,皆火病也。火郁则发之,从治之法,辛主发散故尔。”在论及消石之药性时指出“冰片不属寒性”。汪昂从家叔论生姜药性“体热而用凉”中得到启发,在李时珍“火郁则发之,从治之法,辛主发散故尔”的基础上,明确系统地提出了“味辛者多热,然风热必藉辛以散之,风热散则凉矣”的理论,首次以“体温而用凉”之论解释和说明“本草所云冰片性寒之义”。汪昂以后,仍有汪绂持“冰片终归阴寒”之见[见《医林纂要》(1758 年)],认为辛香药有性温者也有性寒者,不可一概而论,通作“性温”。其实,自古时起冰片的使用就不讲究“气之寒温”,而是重在味之辛散。而汪昂首倡“体温而用凉”论,能够自圆其说、自成体系。推而论之,桂枝之辛温解肌用于温病,荆、防、苏、桂等辛温发散用于风温初起,诸如此类亦皆可以“体温而用凉”加以解释,尽管荆、防、苏、桂之类并无性温、性寒之分歧。

7 结语

《本草备要》不仅仅是本草普及读本,书中作者还以其豁达开明的胸襟广泛吸纳了中西方医学知识,也不乏创新,不少论述至今仍有启迪意义。

浅谈肿瘤患者顽固性呃逆的用药

叶 翊 智

(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医科,100021)

大多数肿瘤患者在接受放疗、化疗或导管介入时不同程度地出现呃逆、恶心、呕吐、厌食、腹胀等消化道反应。随治疗时间的延长,症状加重,明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,甚至部分患者推迟